

读书人文化讲堂·人物系列

改革家

是怎样炼成的

——救时宰相张居正

◎ 刘志琴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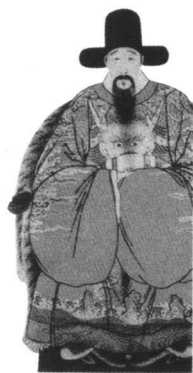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刘志琴 著

改革家

是怎样炼成的

——
救时宰相张居正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:救时宰相张居正 / 刘志琴著.
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2007.4
ISBN 978-7-80170-597-6

I. 改… II. 刘… III. 张居正(1525~1582)-传记
IV. K827=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2324 号

出 版 人: 周一
策 划 人: 邓景异
责任编辑: 宗 边 张 轶
装帧设计: 古 手
编 务: 张新苓
印 务: 寇斯芸
出版发行: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: <http://www.ddzg.net>
邮 箱: 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: 100009
编 辑 部: (010)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
市 场 部: (010)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960×640 毫米 1/16
印 张: 18.5 印张 160 千字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(010)66572159

序言：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

改革家素来是以政绩为评判的依据，政绩都产生于当朝，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？

这个问题的提出，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往往都很悲壮。他们为了富国强兵，鞠躬尽瘁，立下丰功伟绩，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，商鞅被五马分尸，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。他们都是位极人臣的宰相，即使贵为至高无上的君王，在改革中难逃覆灭的也大有人在。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，推行胡服骑射，却被反对派包围，活活饿死。这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都挡不住反对派的反扑，又何以指望当朝对他们有公正的评价？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、惨遭不测的情况下，却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张居正。

张居正是十六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。他从寒微门第中奋起，历经科举考试，从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官至内阁大学士，在万历王朝初年（1573～1582）当了十年首辅，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，把衰败、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，史书上称他为“起衰振隳”的“救时宰相”。

“救时”这是很高的评价，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

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，更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。他的赫赫功绩，堪与商鞅、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、中期与后期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。

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王朝的首辅，王安石是一千年前北宋熙宁王朝的宰相，商鞅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秦孝公的宰辅，他们都是远去的历史人物，可说起他们的改革业绩，却万古流芳，于今不衰。这三人分处于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，是封建社会创始、发展和挽救没落的三大功臣。张居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病而亡，是唯一在生前改革获得成功而得以善终的改革家，可他身后也遭遇不幸，全家被围困，饿死十多人。尽管历史的发展证明，他们力筹富国强兵，功效卓著，惠及后世；他们的改革思想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；当朝的统治者又无一例外地享用了改革的成果，而他们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，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？！

商鞅废除井田制，按军功授爵，奖励耕织，奠定了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，此种变革影响之深远，足以使商鞅成为开创封建社会的第一人。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，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，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。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，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，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，可他俩身后的是

非荣辱大不相同。

王安石实施青苗、均徭、农田、保甲、雇役等多项制度，使得国库转亏为盈，摆脱财政危机；张居正整顿官府，考察名实，清丈田地，推行一条鞭税法，振兴了衰弱的王朝。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，直到封建王朝的终结。不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明朝的张居正，都以他们的丰功伟绩改写了当朝的历史，在后世也都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，但终其封建王朝的历史，无论是最高当权者还是文人学士对两者的评论都很不一样，也使他们承受的荣辱并不相同。

以王安石来说，在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，除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，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，《宋史》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，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，对后世起到了主导的作用。清代的《四库全书》不仅对变法全盘否定，而且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“彰善”的美誉，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则概以“瘴恶”论定，以致有“受谤七百有余年”之说，直到十九世纪末严复、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。

张居正死在任上，虽然得以善终，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。万历十年（1582）六月二十日，张居正病逝，同年年底即遭弹劾，次年“诏尽削居正官秩，夺前所赐玺书、四代诰命”，家产籍没，其兄弟张居易、次子张嗣修被流放，家人被围困饿死的有十多人，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，愤而自尽。

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，比王安石要不幸；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，王安石被诬七百余年，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，崇祯年间全面平反，恢复谥号荣衔，子孙袭职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为张文忠公祠，以供后人瞻仰。《明史》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“海内殷阜，纪纲法度莫不修明。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”。

当张居正被诬之际，皇帝一声令下，群臣莫不胆战心惊，更何况人亡政息，对张居正群起而攻、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。然而就在抄家籍没的当年，刑部尚书潘季驯、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，虽然他们都被视为同党遭受贬抑，但为其鸣冤叫屈者仍然不绝于缕。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“宰相之杰”；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“社稷之勋”；有的刊刻遗集，自行出版；有的抚文追思，怆然泪下。由此可见，在张居正被诬后不久，官员、士大夫就自发地为其辩诬表冤。当然，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，但令人玩味的是，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，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，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，是一批人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。

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，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，但他一复职，即为张居正主持公道，要求宽恕张居正；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，适逢张家被抄，他义无反顾地致信执法人，要求执法时不要株连无辜，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；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，复职后任

吏部侍郎，又因为维护张居正，再次被降职；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，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，复职后以一首《哭张江陵》公诸于世，以示缅怀之情。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，当初因为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，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：“功在社稷，过在身家。”面对张居正，他竟然怀抱内疚，声称“奚愧矣！”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，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。

这不能不使人惊叹！张居正何德何能，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又呼唤他的归来，且不顾个人的恩怨，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？论人品和学问，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，王安石默默地死去，反对派犹追打不息，使其受谤七百余年之久。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，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，还召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，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！喜耶？悲耶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，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。

可这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，竟然发生在明末！是非荣辱的大颠倒又是这样令人不可思议！

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？！

后人的追叙，也许能为我们解开这历史的谜团。

明代人说：

“居正受遗辅政，肩劳任怨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

“板荡之后，而念老成；播迁之余，而思耆俊。”

清代人说：

“恩怨尽时方论定，封疆危日见才难。”

“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

应该说，上述言论只是后人对张居正评价的很小一部分，但这一小部分却道出了足以发人深思的内容。他们都从“日久论定”、“板荡之后”、“封疆危日”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，重新评价张居正，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。张居正逝世后，随着新政的废弛，时局急剧败坏，社会动荡，危机迭起，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、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，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，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，又不甘心王朝的沉沦，梦想追回万历初年的盛景而又时不再来，张居正就成为“起衰振隳”的偶像。当初被张居正踢翻在地、遭到打击的官员宁可丢弃个人私怨，重新拜倒在他脚下，固然表现出了这一批官员对王朝的竭尽忠诚和憨直、无私的个人品节，也是无奈而又无能的选择。

晚明王朝不乏饱读经书、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，可他们所处的十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他们要面对的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，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。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，但在封建社会末世，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。十六世纪末的中国历史，给了张居正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。

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，

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，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，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。多少次农民起义，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，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系统的瘫痪，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、发育起来，愈到封建社会后期，愈强化。发展到明朝，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，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，一切都由皇帝独揽，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。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，衰败的景象却远远超过汉末、唐末和宋末，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，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，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。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现象，反映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，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百病丛生，沉疴临绝，不变则亡。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，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，争得了王朝短暂的复苏。在这之前，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做过尝试，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狼狈离职，只有张居正获得成功，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又遭到皇权的践踏，十年新政，顷刻间灰飞烟灭，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，无论改革成功或失败，改革者都要遭受灭顶之灾，遂至无路可走，这个王朝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。

晚明的历史证明，只有张居正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所以清代人说：“明只一帝，太祖高皇帝是也；明只一相，张居正是也。”明代的皇帝有十七位，

何以只有一帝？因为太祖是开国皇帝，是创建明朝之父；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，何以只有一个？因为唯有张居正才扼制王朝的颓败，成为“救时宰相”，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，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。正因为如此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断言：“明代有种种特点，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。”

拥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明王朝，也有过能人辈出、群星灿烂的辉煌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。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，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，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。明末的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：“手舞足蹈而不能已。”盛赞其是“千古奇人，千古奇书。”这刊刻在万历末年的《张太岳集》，系张居正的奏疏、书牍、札记和诗文的汇编，算不上鸿篇巨著，也不是刻意作文之作，却被明代思想家吕坤评为“庄雅冲夷，真醇正大！”盛赞这是典雅、深刻而又平易近人的精明之识，字里行间充满钦羡之情。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，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。如果说这“奇人”是指他人生经历，那“奇书”当指他的胆识和思想。

兼有奇人和奇书的张居正，生于嘉靖四年（公元1525年），终于万历十年（公元1582年），在五十八年的岁月中，有三十五年参与内阁政务，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代王朝，并在万历初年，以十年首辅的政绩，登上他人生的高峰。



序言：改革家重在身后的评价/ 1

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/ 1

第二篇 少年才俊初长成/ 7

第三篇 进退应对中的求索/ 17

第四篇 经受风云变幻的磨砺/ 39

第五篇 在对外防务中初显身手/ 61

第六篇 洞察时弊的对策/ 73

第七篇 在执政危机中胜出/ 89

第八篇 从政治启动的改革模式/ 109

第九篇 惠农利商的大手笔/ 145

第十篇 近民便俗为本/ 169

第十一篇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/ 1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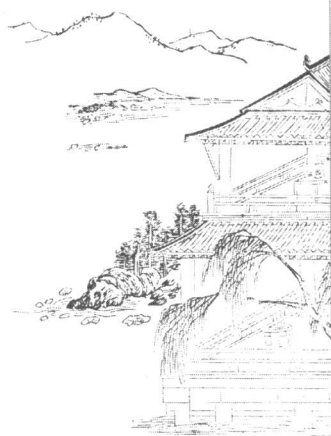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篇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/ 203

第十三篇 新政理想的破灭/ 223

第十四篇 世上已无张居正/ 265

后记/ 275

第一篇 奇才出自平民之家



张居正出生时，家中已是四世同堂，因此他自幼就在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的熏陶下生长。曾祖父的豪爽、祖父的放纵、父亲的执著，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他不是军人，却是指挥千军万马、运筹帷幄、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。

张居正，原名张白圭，字叔大，号太岳，嘉靖四年（公元1525年）生于湖北江陵。古人有以籍贯作代称的习惯，所以又称张江陵。

江陵本属荆州，位于长江的中游，江陵的地名是得之于其面临长江，山丘连绵起伏的地势。这枕山临水，尽得鱼米之利的优越位置，使这一地区从上古就成为华夏疆域的九州之一。秦代时就在这里设立了江陵县治所，成为一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随着历史的演进，起自上古的九州，有的没落，有的变迁，荆州却在后世持续辉煌，且以深厚的荆楚文化名扬天下。

荆州是楚国的发祥地，有二十代楚王在这里扎根，立国四百多年，魏晋时成为魏、蜀、吴三国必争之地。古诗《荆州怀古》说得好：“英雄争战几时休，巨镇天开楚上游，月夜与谁游赤壁，江山自古重荆州。”在这物华天宝之地，有诸多的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大显身手。论文才，也是名家辈出，屈原的楚辞、宋玉的赋、袁宏道的公安派、谭元春的竟陵派等，都在这里成就过雄文华章。陶渊明、李白、白居易、岑参、苏轼、陆游等诸多鸿儒硕学，也在这里留下了客居的芳踪。在人才荟萃的荆楚地区，张居正以改革家独树一帜，以致在历史上又称张江陵者，无有他人，必指张居正无疑。毫无疑问，张居正已成为江陵这一胜地的杰出代表。

然而，这一胜地对张居正一家却是荣衰并俱。张居正祖籍原本在安徽合肥，他的先祖张关保是朱元璋的大同乡，从青年

时起就跟随朱元璋起义，因军功被授为湖北归州长宁所的千户长，自此入了军籍，成为世袭的军人之家。按明代的军制，地方部队分为司、卫、所三级，统兵五千六百人，每卫下设五个所，每所设千户长一人，统兵一千一百二十人，千户所下再分百户所，各统兵一百一十二人。张关保为千户长，属于中级军官，史册没有记录，只是个无名之辈，但这军籍却对张家的子孙后代有重要影响。明代的社会管理分为民户、军户、匠户、灶户四大类，其中以军籍的监管最为严密，每一军户，必须有一丁服役称军丁，余丁可在家务农或从事其他生产。由于张关保千户长的职务已由在归州的长子承袭，因此在江陵的一系子孙不再拥有军职和俸禄，但户籍却还是按原军籍处理，继续承担军中的各种差役。但凡军籍之家，都要受到军制的严格管束，军丁不能更姓易名、过房改户，必须终身服役，除非老死或逃亡，才能由家中的余丁顶补入伍。所以先世为军者，后人往往沦为军中的最底层。

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，就是这样一个有军籍而又要自谋生路的贫民，他生性豪爽，急公好义，自家生活艰难，却尽力周济穷人。因为他爱讲话却有些结巴，因此得了个外号“謇子”，这是当地人对口吃者的别称。张居正初登首辅的宝座，就以曾祖的行事自励，言谈举止，豪迈仗义，颇有其曾祖的遗风。张居正的祖父张镇，是一个谋生无能、行事放纵的兵卒，有痞子作风。他在荆州辽王府当差，为王府把门护院，是为护卫卒，这是军中最低贱的差役。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，别号观澜，是穷困潦倒的落第秀才，居家务农。

张居正曾自述：“余少苦笃贫，家靡担石。”毫无疑问，这种家境只能勉强度日，在社会上处于底层。在身份严明的封建社会，要想改变贫贱的社会地位，唯有走科举道路，通过“学

而优则仕”一步登天，换来荣华富贵。按明朝的制度，只要进了学，成了秀才，家中就可免两个差役，每年还可领到补贴膏火银。如果中了举人，那就很威风，报信的人拿着短棍，从大门打起，把原有的厅堂窗户统统打烂，工匠们跟在后面，立刻修整一新，这叫“改换门庭”。很快同姓乡绅前来联谱的、拿着生辰八字要求联姻的、自称门生来献媚的都会纷至沓来。出门有大轿可乘，赴宴有专设厅堂，犯了罪还可特赦……这对穷苦人家来说真是一步登天！无怪乎，千家万户要争先恐后地走上这一独木桥。

要过这座独木桥，对张家而言实属不易。明代限定军户只能有一名子弟应考，这无疑加重了军户报考的难度，但这毕竟是张家改换门庭唯一的希望，因此全家特别盼望能有一名子弟读书登科。张居正的叔祖父为此孜孜以求，苦读了一辈子，只落得个府庠生的待遇。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，颇有才子之气，二十岁上府学，下笔为文，挥洒自如；饮酒谈笑，不拘一格。可惜他时运不济，七次乡试全都名落孙山，直到自己的儿子成了翰林，他还是个不第的秀才，对此他仰天长叹：“今困厄至此，命也夫！”他把自己矢志以求而终身未遂的愿望寄寓给后代，勉励儿子说：“吾平生志愿未遂，望吾儿树立，用显吾祖。”张居正从政后，一度失意回乡，情绪低落，又是他敦促儿子重回政坛。虽然张文明一生潦倒，却执著地用满腔热情支持儿子在政坛上拼搏。

张居正出生时，家中已是四世同堂，因此他自幼就在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的熏陶下生长。曾祖父的豪爽、祖父的放纵、父亲的执著，以及颇有军人气质的家族传统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他不是军人，却是指挥千军万马、运筹帷幄、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。